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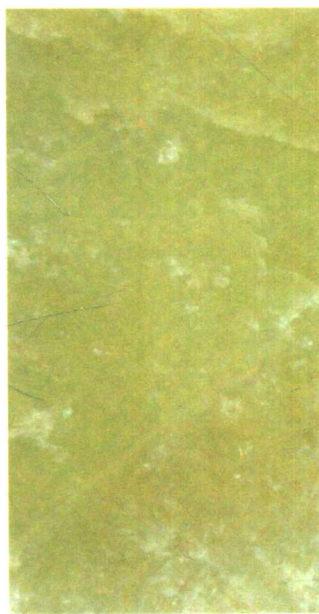
夏 商 卷

陆建芳 主编



喻燕姣 方刚 著

# 中国 玉器 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 主编

---

夏 商 卷

---

喻燕姣 方 刚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 / 陆建芳主编; 喻燕姣, 方刚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841-9

I. ①中… II. ①陆… ②喻… ③方… III. ①古玉器—文化史—中国—夏代②古玉器—文化史—中国—商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9482号

## 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XIA SHANG JUAN

总策划 尹昌龙  
出品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于志斌  
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 梁萍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33133493)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545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330.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建芳

副 主 编 曾卫胜 孔富安 张宏明 刘云辉

张 尉 李银德 方向明 周晓晶

喻燕姣 吉琨璋 欧阳摩壹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明 于志斌 于宝东 孔富安

方 刚 方向明 王志高 古 方

左 骏 刘云辉 吉琨璋 吴 沫

张 彤 张 尉 张宏明 李银德

陆建芳 陈桂祥 周晓晶 欧阳摩壹

喻燕姣 曾卫胜 韩建武

#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sup>[1]</sup>，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sup>〔1〕</sup>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和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sup>【1】</sup>。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珩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维、造型能力的拓展，这一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均已超过了30厘米高，个别器物则超过了50厘米。红山文化出现了玉璧、斜筒形玉器、勾连纹玉佩、玉镯、玉握等系列玉器。良渚文化则形成了有玉琮、玉璧、玉钺的礼玉系统。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这一时期都是我国史前玉器的一个高峰，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 第三阶段：德玉阶段（商末至西汉初）

这个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玉文化核心内涵的形成阶段。由于青铜器大量出现，玉礼器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铜礼器。虽然到战国时期，玉礼器仍很繁荣和发达，但西周时期形成、春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玉器“德”的内涵，此点尤为重要。自此以后，“君子”和“玉德”成为互相关联的两大内容。追求玉的洁白无瑕、致密温润，即“首德次符”成为爱玉首选。如此遂使和田玉逐渐成为宫廷用玉。

### 第四阶段：吉玉阶段（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

这个阶段的方术文化一度普遍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汉不只出现统治者深信可保尸体不腐的玉衣，还出现了一批辟邪趋吉的器物，典型的有刚卯、严卯，司南佩，翁仲，四灵压胜等。从此，玉具有辟邪保吉的功能成为民众共识。

### 第五阶段：民玉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玉器从之前只有世家大族或官员才可以使用佩戴的专用物品，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有钱即可以拥有、买卖的物品。二、玉器的功能逐渐生活化、世俗化。

### 第六阶段：福玉阶段（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玉器的功能走向世俗化。到明清时期，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主题基本上可以用“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来总结，有“连升三戟”、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sup>【1】</sup>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sup>【1】</sup>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刿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 一、夏文化的探索及夏代玉器的分布

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历史文献中常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中原地区居住着许多不同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部落，各氏族之间经过约4000年之久的长期兼并征战，彼此间相互同化，直至舜禅让于禹，继之“禹传启，家天下”，到启时最终建立了夏代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了阶级社会。夏人属华夏集团羌族的一支，发迹于晋南，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由分散迈向统一的时期，王都河南偃师。这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远古人类开始跨进文明的门槛。据文献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400多年（相当于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纪年为前2070年至前1600年）。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和考古资料的缺乏，长期以来，夏代的文化内涵始终不明。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就在已经发现的古遗址中开始寻找夏文化的探索工作了，从徐仲舒、丁山、翦伯赞等人认为仰韶文化就是“虞夏民族的遗迹”<sup>[1]</sup>，到范文澜将龙山文化假设为夏文化遗迹<sup>[2]</sup>，20世纪50年代，河南郑州

【1】徐仲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1931年。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64年，第105页。

洛达庙遗址和登封玉村遗址<sup>[1]</sup>都被视作可能的夏文化。

徐旭生从先秦及汉代文献中找到了大约100条关于夏代的史料记载，其中大部分提及地名，他经过系统考证，认为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山西汾水下游应该是寻找夏墟的重点区域，并于1959年率队在河南省西部的偃师县境内发现了二里头遗址<sup>[2]</sup>。不过当时的考古学还处于一个初创的阶段，对于史前文明的认识尚不明确，还不能确认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直到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后，丰富的文化遗存才使学术界的目光集中到对二里头遗址及其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上来。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宫城遗迹，证实那时已经出现国家社会形态，碳14的测年数据和地望记载都与传说中的夏王朝接近，而且就是夏都斟寻<sup>[3]</sup>。

但是关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以及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和夏王朝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邹衡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与夏王朝的历史是相对应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属于夏以前的文化遗存<sup>[4]</sup>；李伯谦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王朝后期“后羿代夏”至夏桀时期遗存，早期夏文化应该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去寻找<sup>[5]</sup>。

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方法来研究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系统科研工程，它集合了考古、历史、文献、天文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发掘了大量夏商时期的古代遗址，对于推动夏王朝考古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系统阐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年代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豫西龙山文化晚期共同构成完整的夏王朝遗存序列，将夏文化分为以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

[1] 韩维周等：《河南省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2]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 张立东：《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213~226页。

[4]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0年。

[5]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大小城<sup>[1]</sup>、河南新密新砦期遗存<sup>[2]</sup>、山西襄汾陶寺遗址<sup>[3]</sup>等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早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晚期遗存<sup>[4]</sup>。

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工程方法论、测年数据、青铜铭文的解读及文献的勘误和释读等方面一直存在争议，在2003年召开的美国“亚洲学协会”年会上受到较多质疑，在2005年召开的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两种观点也未取得共识。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新砦期遗存的认识上。此后，邹衡<sup>[5]</sup>、陈旭<sup>[6]</sup>仍然坚持其观点，对于新砦期属于夏文化的观点继续持否定看法，没有采纳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最新测年数据<sup>[7]</sup>。杜金鹏<sup>[8]</sup>、李维明<sup>[9]</sup>都主张将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合并，韩建业更是将夏文化提前到早于新砦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sup>[10]</sup>。

由于以上学术观点尚未取得一致，本卷暂遵从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对应的观点，认为夏代玉器是指夏王朝时期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晋南一带，至少有两大族群：一是分布于嵩山周围嵩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二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新的考古学材料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二里头、东下冯、牛角岗、杨庄、下王岗五个类型<sup>[11]</sup>，其中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是出土玉器最为集中的类型。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郑州，2007年。

[2]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文物出版社，北京，2008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年至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4] 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北京，2010年。

[5] 邹衡：《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

[6] 陈旭：《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7] 姜寅虎：《对二里头遗址最新测年报告的学术思考》，《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

[8] 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

[9]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10] 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89页。



关于夏代玉器，多数观点主张二里头文化玉器就是夏代玉器。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包括玉柄形器、玉钺、玉圭、玉璋、玉璧戚、玉戈、玉琮、玉铲、玉刀、玉镯、玉月牙形器、玉尖状器、玉版、玉管、玉铃舌等等。此外还有各种绿松石饰和绿松石镶嵌的器具饰物，大多出于中型贵族墓葬。精美玉器常与青铜礼器、漆器等名贵器物同时出土，表明玉器在夏代，不是普通平民所能享用，具有权力、身份、财富、礼仪等多种含义。从其形制进行分析，夏代玉器明显受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玉器的影响，但由于夏代已处于中国的青铜文化期，冶铸青铜以及青铜工具的使用，对夏代玉器的雕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这一时期的玉器也与新石器时代玉器在风格上有很大变化。

陈志达等人根据山西陶寺类型晚期和陕西石峁类型的地望、放射性碳素断代及重要出土文物的对比等多方面因素判断两地出土玉器也属于夏代玉器<sup>[1]</sup>。1996年及1999年发掘的陕西神木新华遗址发现了一座祭祀坑，坑内出土32件玉石器（其中一件分为4块），全部竖直侧立插入土中，发掘者认为新华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遗存<sup>[2]</sup>，栾秉璈将其中的20件玉器认定是夏代玉器<sup>[3]</sup>。最近在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也发现了相对年代晚于客省庄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文化遗存，其中M83出土有牙璋1件、钺（戚）1件、璧4件，M43出土有璧13件，居址出土有钻芯13件，材质主要是闪石玉的墨玉和碧玉以及大理石，考古资料尚未发表。刘云辉<sup>[4]</sup>、杨亚长<sup>[5]</sup>等人发表了部分玉器资料，认为这些遗址出土的玉器同属于夏文化玉器，“东龙山三、四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已与二里头同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显然应属同种文化，即夏文化”。

虽然上述地点的玉器，尤其是圭、牙璋、戈、钺、玉柄形器等玉礼器与夏代玉器有明显的联系，而且这几处遗址的绝对年代都已经进入了夏代纪年范围，但

[1] 陈志达：《夏商玉器综述》，《中国玉器全集2》，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3年，第1~2页。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

[3] 栾秉璈：《古玉鉴别》，文物出版社，北京，2008年，第283~285页。

[4] 刘云辉：《陕西出土的古代玉器·夏商周篇》，《四川文物》2008年第5期（《艺术考古》总第3期）。

[5] 杨亚长：《陕西夏代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专辑（II）》，台湾大学，台北，2001年，第680~687页。